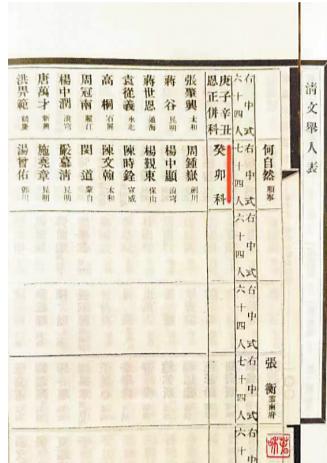


云南的最后一科乡试

张佐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是云南举行的最后一科乡试。第二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科会试和殿试后,在中国盛行了近1300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落下了帷幕。



《新纂云南通志》卷十六
“清文举人表”对1903年癸卯
恩科云南乡试中式者的记载



云南贡院腾蛟坊上的“为国求贤”匾 耿嘉 摄

云南贡院为国求贤坊在科举终结后转为东陆大学之门

精心出题 不辱使命

据《光绪政要》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公历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上谕,力主改革科举:“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绪余,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则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规定从次年开始,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生童岁、科两考也要考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并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并明确规定“以上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

癸卯恩科云南乡试的内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张星吉,副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吴庆坻,同考官为田亮勋等八位云南知县级的官员。外策官为云南巡抚林绍年和光绪十六年(1890年)庚寅科状元、云南学政吴鲁等80人。主持考试和负责出考题的张星吉和吴庆坻虽然都是学问深厚的翰林院编修,对如何主持乡试和如何出考题都有一些经验,但该科乡试不考八股文,考试从内容到程式都与从前不同,衡文的难度也比以前大得多,必须认真考虑、仔细斟酌,反复磋商拟定出朝廷认可,考生能接受的考题,才能不出纰漏。二人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设计了一套既有时代特色又继往开来的考题。

第一场论题

一、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论
二、唐太宗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省内,数延见,问民疾苦、政事得失论
三、宋太祖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论
四、韩琦刺史勇,司马光力争之;王安石行保甲,司马光请罢之论
五、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

第二场策题

一、东西诸国政富强之政,实与《周礼》隐合。试详加甄辨,引申其说,使学人知复古即维新、渐化中西畛域之见策。
二、泰西商务出口税轻,入口税重,所以防利源外溢也。且董以商会,平以商肆,辅以银行,以故商务日兴。中国自互市以来,利权渐失,朝廷特设商部,改订商约,应如何妥筹?抵制之方以收利权,裕度支策。

三、西人精研农学,具有专书。中国广农民利,宜设农学、劝垦荒,采月书法,讲求树艺、畜牧为殖民阜财之策。
四、兵强固在器利,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识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仿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蒐军实策。

五、各国皆用金币,一时骤难仿行。宜广铸银元,精良画一,以就圜法之敝策。

第三场四书、五经义题

一、“固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之”义
二、“乐天下者保天下”义
三、“凡官民材必先论之,论辨然后使之,任事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义
统观这套考题,内容涉及古今中外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云南的边防,即使是传统的四书、五经题也与当时的社会改革有关,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考题视野开阔、设计周密、用心良苦,张星吉、吴庆坻两位考官确为不辱使命之人杰。

优秀人才 脱颖而出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参考的云南士子多达3769人,年纪最小的考生仅有十四五岁,年纪最大的考生竟有六七十岁。由于是最后一次乡试,大家无不摩拳擦掌,奋力一搏。放榜时,录取正榜66人,副榜10人,共76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二。其中解元(举人的第一名)为二十六岁的剑川人周钟岳,亚元(举人的第二名)为二十五岁的浪穹(今洱源)人杨中显。

周钟岳高中解元,其三场考试的试

卷均得到考官们一致好评。云南著名学者海淞先生主编的《云南考试史》先述二十九年(1903)癸卯恩科云南乡试对周钟岳、一、二两场考试的答卷有如下详细分析:周钟岳选做第一场第五题“滇边形胜今昔不同,试举历代控制三方,舆地险易之势,博稽图籍以筹边备论”,作者通过对古今滇边防守要略的对比之后,指出,云南过去所谓“九险八关”的边防体系早已过时了。当今局势“英攘缅甸;法据越南。是为越、缅两防最为重大。”周钟岳还具体提出了新的边防体系。第一是“筹西防”——建议以野人山为其实地,“守野人山九道,以遏其阑入”;其次“孟良在潞江之滨,为边隅重镇”;“树浆厂……为藩篱锁钥要地,不可为外人所据”。第二是“筹南防”——建议先“屯兵于河口,而分防于那龙、龙脖、新店、老卡、茅坪、天保、董干、田蓬、诸沉,以为策应。”再以“九龙江之六要隘,木嘎、普里方之二要隘”作为后备防线,则“云南可守矣!”从该文阐述的观点可以看出周钟岳对云南的边防颇有研究。

周钟岳选做第二场第四题“兵强固在器利,然将帅非人,利器无用。泰西水陆将弁出自学堂,故将皆知兵,兵皆识字,其练将之法若何?称名将者几人?宜仿其良法实力,整顿武备学堂以储将才而蒐军实策。”周钟岳对这一连串问题的看法是:“兵器再好不如将与兵得人得练”。泰西“练将”是从小培养,“练兵”则常备不懈,且其武备教育不仅只是练习军事技术,更要学习数学、几何、史地等文化知识,“练兵”则重视战前演习,如其海军“选派至兵舰练习,风涛海操已熟,乃赴水师学堂学习驾驶”。等考试合格后,才可带兵打仗。并列举了惠灵顿、哈飞、毛奇、绿纳尔逊等西方著名将帅,称赞他们“非知兵识字,文武兼资者乎?”于是论称“练兵犹易,练将为难”。强调将帅必具有“胆识”和“技艺”——“审形势,演阵法,习测绘,精驾驶,认沙礁,皆为将兵者所有事。”同时,还须进一步学好战术学、营垒学、地势学等,设计了一套既有时代特色又继往开来的考题。

周钟岳考中举人后,成为民国年间云南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周钟岳从日本弘文馆师范专业毕业,又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法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回国后,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云南学务所课长。昆明“重九起义”后,历任云南都督府军政部参事、参议院参事,登庸局局长、都督府秘书处长等职。1912年任云南教育司长,1913年被袁世凯任命为滇中观察使,1914年任北洋政府经界局秘书长,1917年任四川督军公署秘书长。1918年回滇,历任靖国联军司令部秘书长、代理省长、省长、盐运使、秘书厅厅长、内务厅长、通志馆馆长等职。1939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总统府咨政等职。1953年任云南文史研究馆员,1954年担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

周钟岳是一个政治家、教育家,更是知名文人和学者。长于写公牍的周钟岳,最受蔡锷、唐继尧的器重,他们的重要文电,多出自周钟岳之手,而他的书法得其舅父罗文昭及老师赵藩的传授,笔法雄浑、结构严整,留存于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光复楼”横匾、石林大石林景区的石刻“石林”,南京总统府大门“总统府”直匾等都是他亲自书写。周钟岳的诗文主要收编在《惺庵诗稿》《惺庵日记》《惺庵回忆录》内。他17岁便写诗,58岁时已作诗700多首,袁嘉谷称赞其诗“古体原本于韩,近体逼杜,诙奇之趣,工巧之对,妙造之格,苏为近之。”1917年底,周钟岳跟随着唐继尧进军四川重庆,途经贵州毕节时,见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深感不安,写下了一首忧国忧民的七律: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改革开放45周年
云南故事

编者按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程,这是一条思想解放之路。45年前,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到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再次焕发活力。改革开放45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在这伟大进程中,云岭大地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进取、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他们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推动者、亲历者。

本期开始,文史哲版开设“改革开放45周年·云南故事”专栏,用鲜活的历史,讲好改革开放故事,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展现改革开放45年来的伟大成就,汇聚磅礴伟力,谱写改革开放云南新篇章。

何正喜的1556元超产奖 该不该发?

端和巧

1977年,楚雄州元谋县大塘子村生产队会计李国有给县委书记写了一封信,信里建议“将任务产量联产到组,对超产计划产量的组和对集体贡献大的个人给予奖励”。谁也没想到,这一封信不仅影响了大塘子村,也影响了楚雄州以及整个云南省的改革进程。

当时的元谋县委根据李国有提出的建议派出工作队实地调研,制定出一系列管理办法,新的管理办法实施一年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各县纷纷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相应的措施。为解决集体养蜂场亏损困境,1978年初,大姚县作出了《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惩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集体蜂场建立“四定一奖”(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部分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政策,切实推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决定”下发后,大姚县农民何正喜主动站了出来,承包了大队的一个养蜂场。何正喜从小跟着父亲养蜂,耳濡目染中掌握了养蜂技术。1961年,他从部队退伍后回到家乡,打算继续发展养蜂“事业”,为了提高专业度,何正喜从书店购买了养蜂专业书籍,开始钻研养蜂技术。他利用工余时间,一边学习新技术,一边改进家中的养蜂方法,经过不断尝试改进,他的养蜂技术得到了很大提高。1975年大姚县赵家店公社毛稗田大队办起养蜂场,何正喜成为了专职养蜂员。

1978年3月,何正喜承包大队养蜂场后,一刻也不敢懈怠,把日常学习的技术运用到养蜂中,通过艰苦努力,精心饲养,蜂群饲养量和蜂蜜产量都超过了全县养蜂生产的最高纪录,当年产蜂蜜6274公斤,纯收入11384元,超收9029元,扣除国家对蜂蜜提价因素,实超收7782元,按承包时规定,以超产部分20%计奖,他应得奖金1556元。12月21日,赵家店公社召开按劳分配奖励兑现大会,何正喜戴着大红花走上主席台,领到了1556元的超产奖金。1556元奖金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小数目,之前县里对农副业生产队的奖励大多是一些口缸、毛巾或象征性的奖金,这么高额的奖金可谓是稀有出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正喜获得超



养蜂能手何正喜(资料图片)

产奖金1556元的消息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79年1月17日,新华社以《养蜂能手何正喜获超产奖一千五百多元》为题向全国播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全国26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各地对何正喜这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展开了相应的措施。为解决集体养蜂场亏损困境,1978年初,大姚县作出了《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惩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集体蜂场建立“四定一奖”(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部分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政策,切实推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1978年3月,何正喜承包大队养蜂场后,一刻也不敢懈怠,把日常学习的技术运用到养蜂中,通过艰苦努力,精心饲养,蜂群饲养量和蜂蜜产量都超过了全县养蜂生产的最高纪录,当年产蜂蜜6274公斤,纯收入11384元,超收9029元,扣除国家对蜂蜜提价因素,实超收7782元,按承包时规定,以超产部分20%计奖,他应得奖金1556元。12月21日,赵家店公社召开按劳分配奖励兑现大会,何正喜戴着大红花走上主席台,领到了1556元的超产奖金。1556元奖金在当年可不是一个小小数目,之前县里对农副业生产队的奖励大多是一些口缸、毛巾或象征性的奖金,这么高额的奖金可谓是稀有出现。

一石激起千层浪,何正喜获得超产奖金1556元的消息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79年1月17日,新华社以《养蜂能手何正喜获超产奖一千五百多元》为题向全国播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云南日报》等全国26家报纸转载了这条消息。与此同时,各地对何正喜这1556元奖金该不该发展开了相应的措施。为解决集体养蜂场亏损困境,1978年初,大姚县作出了《关于集体蜂场实行超产奖励和减产惩处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定集体蜂场建立“四定一奖”(定面积、定产量、定成本、定报酬,超产部分奖给作业组,组里再评定到人)政策,切实推行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作者单位为省委党史研究室)



百年海口川字闸:滇池治水之见证

海口川字闸是古代人民治理滇池的智慧结晶

海口川字闸,又名屡丰闸,位于昆明海口河滇池出水口处,是一座桥闸结合的多孔石拱桥,滇池水经此闸导入螳螂川,普渡河,流入金沙江。川字闸建于清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迄今已有187年,全长109米,共21孔,桥面宽3米,分跨于由河心小岛分隔形成的三股河道之上,每个桥孔两侧桥墩设沟渠,可启落木板为闸,故称川字闸。海口川字闸是我国最大的古代桥闸结合的多孔石拱桥,如今南桥闸保存最为完整。川字闸是滇池蓄水、排水的枢纽工程,既是古代水利设施,又为水陆交通提供了方便,凝结着滇池水利文化的精华,被誉为“古桥闸之典范 滇池治水之见证”。2019年,昆明海口川字闸被列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杨峰 文/图



桥面被磨得锃亮,显现出岁月的痕迹。游人往来驻足,与时光合影。